

新冠肺炎治疗筛选出“三药三方” 超九成患者使用中医药治疗

全国调来 4900 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经过实践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3 月 23 日下午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西医专家介绍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重要作用及有效药物。



重庆市城口县天宝药业有限公司员工在整理库房内的成品中药材。

1 中医药作用成为这次疫情防控一大亮点

“社会各界认为，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中央指导组成员、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中医药局党组书记余艳红介绍，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 74187 人使用了中医药，占 91.5%，其中湖北省有 61449 人使用了中医药，占 90.6%。

“集中隔离，普遍服中药，是阻止疫情蔓延的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介绍，数据显示，2

月初“四类人员”当中诊断确诊比例是超过 80%，中旬就降到了 30%，到 2 月底下降到了百分之十以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西医专家邱海波说，中医药在这次新冠肺炎救治中尤其是重型和危重症病人的救治中，从目前临床的观察来看，对重型和危重症病人的治疗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降低了轻症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的转化，二是降低了重型向危重症

的转化，三是用于重型和危重症病人的治疗，四是用于重型和危重症病人的康复。

“应该说，中医药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转化过程中已经看到了疗效，重症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康复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邱海波说。

余艳红说：“这次的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中医药学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屡经考验，历久弥新，值得珍惜，它依然好使、管用，并且经济易行。”

2 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一批有效方药

张伯礼表示，手里有药心里不慌，每次在一个大疫过后，都会出现好药，所以有一句话叫“大疫出良药”。这次疫情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也没有疫苗，于是我们就跟西医同道一样，注重从老药里筛选有效的药，同时也研制了几个新方，也就是“三药三方”。



余艳红介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早期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总结中医药治疗病毒性传染病规律和经验，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结合临床实践，形成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成为中国方案的重要特色和优势。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为代表的

一批有效方药。

邱海波说，从西医来看，多数的化学药物都是单靶点的，而中医和中药更多是多靶点的。也就是说，中药更多的像个团队在作战。

邱海波援引复旦大学白春学教授的研究表示，包括 33 家医院完成的“血必净与安慰剂治疗重症肺炎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结果显示，血必净联合常规治疗以后，可以明显降低重症肺炎患者的 28 天的死亡率，能够下降 8.8%，而且

能够明显使得肺炎渗出吸收更快，器械通气的时间缩短，住院的时间也能缩短。

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连花清瘟是在治疗非典时期研制的一张处方，主要的功效也是清热解毒、宣肺泄热，治疗轻型和普通型的新冠肺炎患者有确切的疗效。

张伯礼介绍，目前我国已向意大利援助了 10 万盒连花清瘟胶囊。最近，意大利还要追加，可能要再寄 10 万盒支援意大利的抗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认为，中医和西医虽属于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对健康、疾病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但是它们都会基于临床疗效这一事实。大量临床对照表明，“三方”均在新冠肺炎的治疗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中医药界愿与国际社会分享防疫和救治经验

“中国的中医药界愿意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分享防疫和救治经验，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效中成药、专家咨询和任何力所能及的援助。”余艳红说。

“中医药是一个伟大宝藏，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余艳红说，中医药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仍然是人类抗疫的重要武器。现在中国已通过远程视频交流、提供技术方案等，向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新加坡等国家分享

救治经验。已经向意大利、法国等国和我国港澳地区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捐赠中成药、饮片、针灸针等药品和器械。

“不担心西方病人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医。”黄璐琦说，现在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地区，103 个 WHO 会员国认可使用中医针灸，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修订版纳入了基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

“在国家诊疗方案推荐的方

剂的基础上，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结合临床实践优化而成的化湿败毒方，被国外朋友亲切地称为‘Q-14’。”黄璐琦解释道，Q 英文谐音 CURE，取治愈、解药的意思，“14”表示这张方子是由 14 味药组成。进而引申为一句俗语，就是“One for all, all for one——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表明中国愿与各国人民并肩作战，共抗疫情，共享中医药的经验和成果。

据新华社

相关链接

中医药是独特的医疗资源

中医是人文医学和生命科学的结合体。中华文化和中医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中医药作为独特的医疗资源，不同于西医药，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强调个性化，所以，可能几个医生开的处方治疗同一个病人都不相同，但都

能把这个病治好。中医是科学，指导用哲学，表述是文学，辨证是美学，治疗充满社会学，中医学多尔雅，法无定法最风流。中医“筑基于针灸药，建勋于有理论，妙在辨证。”中医的优势就是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

据《中国中医药报》

延伸阅读

历代医家治疗疫病的经验

张仲景 解表散寒

东汉中期，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后汉书·五行志》记录有 10 次疫情，尤其建安年间（196-219），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战争频繁，饥谨连年，气候寒冷，以至出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悲惨状况，面对疫病流行的惨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

李东垣 补中益气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记述了公元 1232 年间疫病的流行，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其实是一种以脾胃内伤为基础的外感病，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医学史略》）。李东垣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疫病的典范。《东垣试效方》还记述了泰和二年（1202 年）一次疫病流行，东垣用普济消毒饮治疗。

吴又可 燥湿解毒

吴又可经历了明代崇祯辛巳（1641 年）之疫，《瘟疫论》说：“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

者”。1642 年，吴又可“静心穷理”，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瘟疫论》。《瘟疫论》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成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立了新的病因学，“杂气”说，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特征基本相符。二是创立新的病机学说，邪自口鼻而入，侵入膜原。三是创立新的治疗学，疏利透达膜原法，创立达原饮治疗，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观点。

余师愚 两清气血

清代余师愚经历了乾隆三十三年之疫，《疫疹一得》中余氏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余氏总结前人治疗经验创立的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治疗。

中医预防瘟疫没有疫苗，但对天花的预防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接种术。就是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时，还没有定论，但到明清时，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他们在继承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中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

晚综